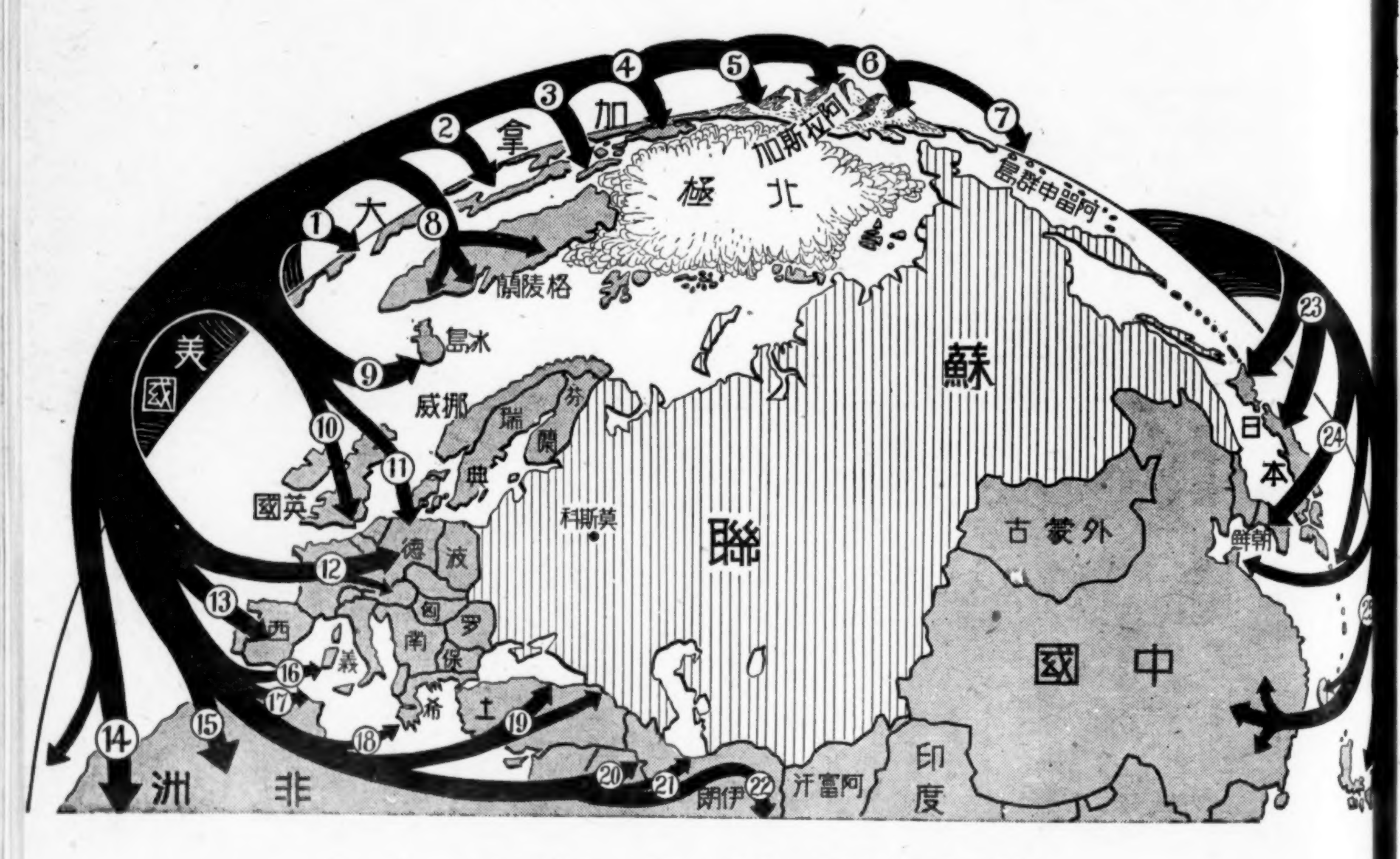
國際 政治 經濟 文化 週刊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十九期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美國的世界基地

圖畫中的世界

美國走向戰爭？

在大戰結束後的第三年，從美國又傳來了一片戰爭的叫囂。擴軍、備戰、反蘇、反共，……一九四八年彷彿又是一九三八年了！然而，人類真的要走向毀滅之路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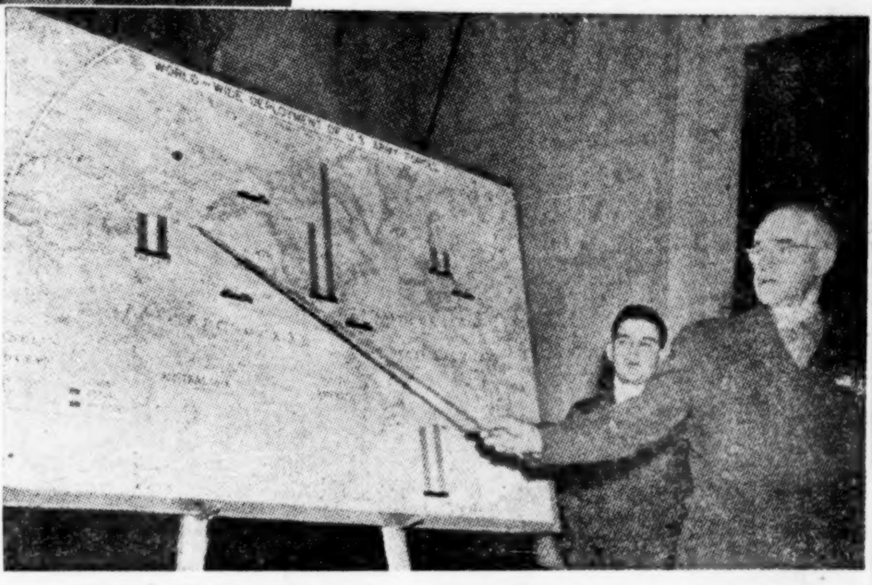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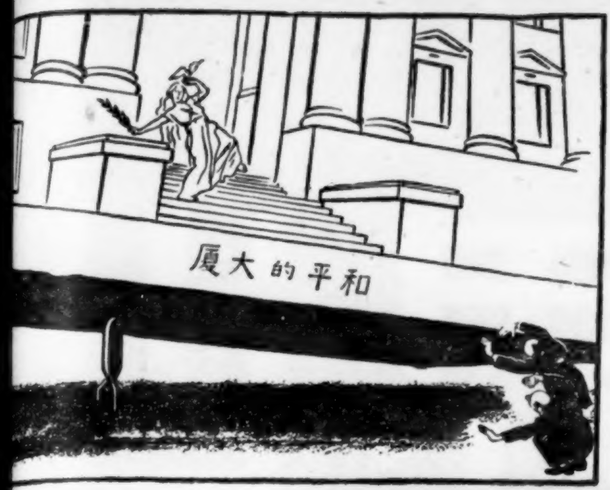
（上）美國人力財力再動員圖

（右）美國軍人政治的巨擘——國防部長福萊斯特

他是華爾街狄隆李特公司的老闆，他的權力在美國政治軍事上是極大的。

（下）美軍參謀總長勃萊特萊說明着海外美軍分佈的情形。





（上）和平的大廈

＊ ＊ ＊ ＊ ＊ ＊ ＊

（下）美國援外法案的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十九期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世界知識編輯部

發行人 王德鵬

發行所 世界知識社 上海(○)河南中路八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電報掛號九三四二

印刷者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 目錄 —

零售：每冊法幣五萬元

預定三月共十二期計

平寄：五十萬元

掛號：六十二萬元

航平：六十七萬元

航掛：八十萬元

國外平寄：半年美金四元

·郵費漲價另函通知·國內外各大書店均售·

瞭望臺

美蘇換文

在戰爭的叫囂聲中，在「美蘇的緊張」被過度喧染聲中，莫斯科各報及電台突於五月十日公佈了美駐蘇大使史密斯與蘇聯外長莫洛托夫交換函件的全文。史密斯於四日致函莫洛托夫，表示「美蘇兩國間的目前關係，爲使美國人民和政府嚴重失望的淵源。就美國而言，用談判來解決歧見的門戶始終洞開。」莫洛托夫的覆函答稱：「蘇聯政府對於美國以談判解決兩國間現有歧見的建議，表示贊同」。這一新聞傳出以後，頗引起了國際的興奮。如法國的報紙，都一致表示歡欣，當天巴黎的美元黑市從三百五十八法郎跌到三百四十五法郎；倫敦的外部發言人稱「出於意外」；「標準晚報」說是「好消息」；路透社記者認爲這一換文乃「一重大的發展，爲最近兩年來努力於持久和平的第一次」。現在我們當然還無從推測它發展的結果如何。但由此可見，在目前緊張的國際形勢中，人們的神經已變得如何的極度的衰弱了：一聞戰爭則懼，一聞和平則喜。猶如在悶熱的夏天的黃昏，人們都爲一陣涼颸而感到喜悅。莫斯科的這一宣佈，無疑在熱辣的戰爭叫囂中具有清涼劑的作用。世界的人民，沒有一個要戰爭，由此更得到了證實。

在史密斯和莫洛托夫的函件中，美蘇兩國有了一次向世界重行表明自己政策的機會。我們從雙方的表白，可以增進對於兩國政策乃至國際現勢的認識。

史密斯函中說明：美國人民的關切與注意，已隨蘇聯對歐洲復興計劃所持的敵視態度而俱增。美國的世界政策已具肯定性，雖今秋美國選舉的結果，亦不致發生影響；美國縱有經濟危機，但不致影響美國的工業能力，或其外交政策所基的急進因素。他又聲明「美國對蘇聯絕不具有敵視的態度，或侵略意向。美國相信如果蘇聯願與其鄰國和平相處，而不事企圖直接或間接干涉他人之事務，則美國之政策對於蘇聯的利益決不致具有任何難以接受的影響。就事實上言，美國如無援助他國，保護其政治完整的必要，以抗少數共產政黨奪取政權而建立俯首於外國利益政權之企圖，則美國外交政策中之許多因素，決不致引起蘇聯報紙如此嚴重的抨擊」云云。

莫洛托夫的覆函，除表示「蘇政府對於美國政府改善兩國關係的志願，採取積極態度」外，又聲明數點：他不同意「美國政府說目前美蘇間不滿意的關係及國際局勢的緊張狀態，係由於蘇聯在東歐所取政策及蘇聯增加勢力所致」。蘇聯與其鄰邦各國及歐洲他國關係的改進，目的專在防止德國或其可能盟國再度發動侵略。美國加緊其與鄰邦關係的政策，如加拿大、墨西哥及其他美洲國家等，亦同樣爲蘇聯所諒解。他又不同意「美政府聲明說美國政府在若干外國所採取某種引起蘇聯不滿的外交政策，乃係蘇聯干涉此等國家內部事務所造成。」他說東歐若干國家的民主政策，乃係各個國家的內部事務，固非任何人所得非議。

他指出從事干涉他國內政的乃是美國，希臘僅爲其中的一實例。他指出「美政府在全球各地，包括蘇聯毗鄰土地，普建海陸空軍基地，而美國報紙及政府若干官員，復公然說明此等基地意在包圍蘇聯，更足以鼓勵當前國際緊張局勢的造成。」他又指出「西歐五國軍事同盟的成立，係因美國政府的主持而始獲實現，該公約的對象，不僅在於德國，亦又針對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一切盟國」云云。

從雙方的函件，再按之目前發展的事實，我們對於目前國際形勢，當不難有明白的認識。

美蘇能協調嗎？

美蘇能否協調呢？一個是社會主義的强國，一個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領袖。兩大國家倘能從解決歧見而改善關係，這對於世界和平當然大有好處。史太林早已說過：兩個不同的社會制度的國家，是可



庸人自擾　（美國「時代」雜誌）

以和平相處的。美國第三黨運動的領袖華萊士，也會不止一次地呼籲過。

卻說這次交換的函件發表後，史密斯正在柏林的返國途中。他很驚異地表示「這實在破壞了機密」，因爲他與莫洛托夫的接洽，據說是完全機密性的。十一日，杜魯門總統和國務部也趕緊發表聲明，否認美國照會乃與蘇聯舉行談判的序曲，並宣佈「美國對經濟與軍事的援助西歐，其決心未見動搖。」在乍展的曙光中，這一勺「冷水」（華盛頓廣播語）自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



工黨的「中間路綫」

（蘇聯「新時代」周刊）

然則史密斯既已建議於前，杜魯門總統爲什麼又否認於後呢？關於這，我們還沒有充足的材料，自難加以斷語。但據一般推測，這很可能僅是美國企圖壓迫蘇聯的「和平攻勢」，外以掩飾其日益露骨的軍事擴展的面目，內以抵銷華萊

決心，用事實說明了，國際緊張局勢的癥結何在，責任誰屬。也就是說，這樣一來，將多少抵銷了它在國內外好容易製造起來的「戰爭氣氛」的作用。因此，杜魯門總統便故作「冷淡」，連說「美國決心推行援助西歐的政策」「美國的政策不變」了。

這不過是推測。在世界人民的期待和推動之下，弄假也許可以成眞。我們當然希望美蘇兩國的關係眞能改善。不過，眞正的和平必須有誠意，有勇氣，不含有別的作用。究竟誰是爲了眞正的和平，這裏將又面臨一次考驗了。

東歐與西歐

據合衆十一日電：「華盛頓官方人士承認，蘇聯的政策聲明，已成功地使美國處於外交上尷尬的地位。蘇聯使全世界得到一種概念，即蘇聯歡迎與美國進行和平會議。……美國同時不欲給予世界一種印象，即美國認爲解決世界各問題僅需舉行最高會議即可。」

就事實而言，美國身上的「包袱」太多了。莫洛托夫的信上僅舉出了希臘。其實，德國、日本、巴力斯坦、朝鮮……都何嘗不是「實例」呢？

就說東歐與西歐。在這歐戰勝利三年後的今天，東歐與西歐無可諱言地日益成了顯著的對照。

五月九日，捷克政府頒佈了新憲法。這表示捷克自肅清國內的陰謀份子以後，已邁步走上了人民民主的道路。同時，羅捷公約也在談判中，不久即可締成，東歐各國爲了鞏固和平建設的安全網，是日趨完備地發展着。

在西歐，分裂的西德政府的組織雖一談再談、

美」意，成立圓滿的協議；另一方面，則德國人民都不贊成分裂，在英美法佔領區內，德國人民的生活日趨惡化，不滿的情緒日甚，最近英美佔領區的工潮此起彼伏，就是明證。

西歐聯盟的發展，也並不是順利的。美英本想把西歐聯盟引伸到北歐，但到今天爲止，怎樣的壓力還不能使北歐「就範」。據八日路透電稱：「瑞典方面認爲非於挪威放棄西傾政策，參加瑞典的嚴格中立政策後，始願與其締結防守同盟。」

英國總該是西歐聯盟的大台柱吧，但她最近卻與東歐新民主國家之一的匈牙利締結了貿易協定。據法國新聞社電稱：「英國貸與匈牙利的商業借款將由二百三十六萬四千鎊增至六百五十萬鎊。預料英國由匈輸入的貨額將因此增高三倍。據五月一日發表協定的全文觀之，英政府決計與蘇聯衛星國增進貿易。英國與南斯拉夫方恢復貿易，而英匈貿易協定即繼以成立，今且擬與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訂同樣的協定」。這一舉，在英國是爲了「實逼處此」的自己利益，在客觀上證明了東西歐的不能分裂。但對於美國分裂歐洲的政策，卻無疑是很大的諷刺。

由於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帝國主義者的聯盟不會是穩固的，這眞是一句顚撲不破的名言。

從希臘到朝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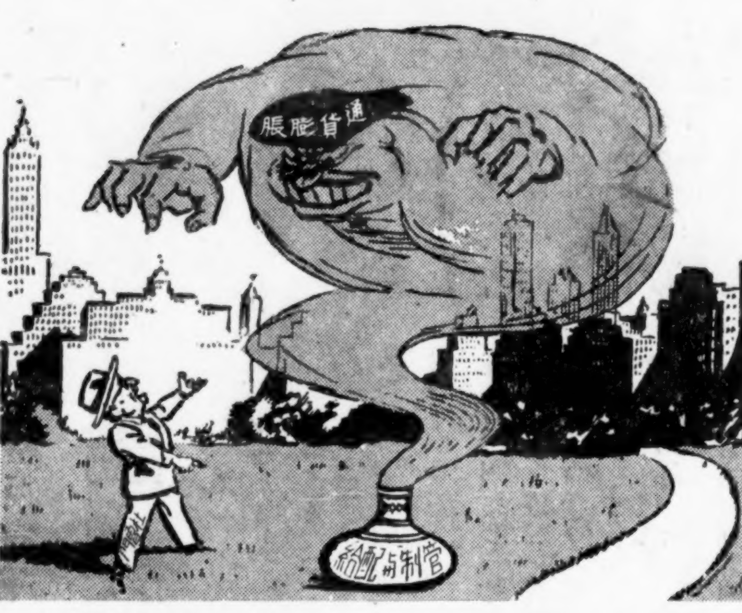
昨天是英國，今天是美國；昨天是希臘，今天是朝鮮了。但明天的朝鮮，會不會變成今天的希臘呢？

五月十日，南朝鮮終於在霍奇將軍的刺刀之下

過是親美的李承晚和親日的金性洙之流……。李承晚在選舉之前的談話，對於這次選舉，頗具「畫龍點睛」之妙，他說（大意）：「余如當選，當要求蘇軍退出朝鮮，而要求美軍長駐朝鮮。」

南北朝鮮各政黨的平壤會議，曾決議誓不承認南朝鮮分裂派的單獨選舉，並分別致牒華盛頓和莫斯科，要求撤退駐軍。蘇聯由北朝鮮蘇駐軍司令柯羅特柯夫答覆，表示「美國政府如準備採取同樣措置，蘇聯願立即自朝鮮撤退一切軍隊」。美國的答覆是霍奇的「決不撤兵」的千言文告，一頓臭罵，並且扶植了李承晚。

美國爲什麼一定不顧大多數朝鮮人民的意志，不顧朝鮮的經濟的條件，而偏要使之分裂，偏要用槍刺來支持少數的反動份子呢？很簡單，要把朝鮮造成「希臘第二」，照聯合社的說法，因爲「就軍事觀點言，朝鮮實具最高戰略的價值」。南北朝鮮各政黨會議要求的是朝鮮的完整和統一。不顧朝鮮人民的一致要求，難道就是爲了如史密斯大使所說爲了「保護政治完整的必要」的「援助」嗎？



新「小人國」裏的巨人　（英國「每日快報」）

朝鮮與希臘是有不同的，朝鮮不會成希臘。但即使在希臘，強權者也已經失敗了。五月八日合衆電說：「在希臘，會有英軍兩師作戰一月，邱吉爾還特別到雅典走了一趟，以澄清其局勢。現在雅典有一個墓場，其中埋的完全是英國人。英國在希臘已經失敗了。」然而已經失敗的豈止是英國？豈止在希臘？

血戰聖地

聖地的血戰愈來愈烈，情勢也愈來愈複雜了。聯合國代表阿茲卡脫（P. Azcarte）已到耶路撒冷，據說即在巴力斯坦設立非常行政機構，並與安理會的停戰委員會合作，從事促使停戰的努力。

阿拉伯軍遭了兩次大敗，猶太軍打通了耶城與台拉維夫（Tel Aviv）間的通路。猶太人正謀依照分治計劃成立猶太國，傳說古禮安（Ben Gurion）將出任總理。

埃及國王法洛克（Farouk）十二日宣佈不能容忍中東成立猶太國，並完成戰時體制。

英國拒絕了美國要求英軍展期撤退的建議，美國顯然很感窘急，據說美國在聯大政委會的秘密會議中又提出了「不干涉巴力斯坦」的「新政策」，主張延遲到九月再來解決。

扶植日本的現階段

繼海上保安廳的決定之後，日本第一所的警政大學已告成立。據紐約時報載稱，美軍工程隊已用了一千三百萬美元在本州北部青森縣境構造大空軍的根據地。百分之六十的工程已經完成，到今年年底，這根據地可全部落成了。美國對日本的扶植，確已到了軍事的階段。

最近，蘇聯出席遠東委員會代表潘友新，曾在該委員會發表聲明，要美國應以更坦白的態度，對其戰時伙伴解釋美國打算在日本做什麼事情，以及採取此類行動的理由。據合衆電傳，「蘇聯此項立場，深得中國、菲律賓、紐西蘭和澳洲的支持。」這是每一個遠東特別是中國的人民所要考問的。

夏天怎麼來得這樣快？　（英國「倫敦快報」）

★

「大地毀滅論」的作者蒲立特來到了中國，此刻正在中國各地訪問中。

美援駐華代表團團長的人選已由霍夫曼宣佈爲賴普漢（Roger Lapham），賴氏曾任舊金山市長和夏威夷輪船公司的總經理。

五、十三。

論美蘇關係的轉機

余孟如

「美蘇關係的目前狀態，乃是造成美國人民和美國政府嚴重失望的一種來源。……就美國而言，進行充分談判與解決歧見之門，是始終敞開着的。」

——五月四日美駐蘇大使史密斯致莫洛托夫函

「目前美蘇關係中的不滿意狀態和國際局勢的緊張性質，實爲美國政府目前所採政策的結果。……蘇聯政府的始終採取對美和平合作的政策，乃是蘇聯人民一致支持的政策。」

——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覆史氏函

一

五月十一日莫斯科電台發表的美大使史密斯與蘇外長莫洛托夫交換的外交函件，對於幾個月來國際間緊張和動盪的局勢，有着很大的澄清和安定的作用。從本年初到現在，整個的國際間，特別是美蘇之間，充滿着整軍備戰的空氣，世界人民惶惶不安，投機的野心家則以第三次世界大戰爲唯一的賭注；現在，美蘇雙方聲明彼此並無敵對侵略的意圖，而且願意設法解決一切的紛歧。這對於愛好和平的人民，是一個很大的安慰，而對於興風作浪的冒險份子，則不嘗給與當頭的一個打擊。

史密斯大使與莫洛托夫外長的兩個函件，以及史氏後來的補充聲明，是值得關心當前國際情勢者的仔細研究的。我們不容否認，在美蘇之間，對於當前的世界情勢，存在着許多歧異；但是，這兩個外交函件的態度，是相當坦白和誠懇的。它們坦白地說明各自的立場，指責對方的態度，同時聲明它們之間的歧異並沒有發展到包含敵對或侵略的意圖，因而希望彼此能够改變態度，解除誤會。這是說，對於當前國際間的歧異，美蘇雙方都沒有用戰爭來加以解決的企圖，這是值得重視的第一點。

其次，就這兩個文件的內容看來，美蘇之間的歧異是在那裏呢？第一是對於鄰國的擴張或干涉的問題。美國認爲，蘇聯對於它東歐的鄰國，可以爭取和平與友好的關係，但是不應直接或間接的支持那些國家內的共產黨，幫助他們獲取政權。在蘇聯方面，它認爲它有權改進它和它近鄰國家的關係，正如美國有權改進它和它近鄰國家的關係一樣。它又說明，東歐國家內民主力量的生長，是反法西斯反納粹戰爭勝利的自然結果；至於蘇聯和這些東歐鄰國之間，都已經建立了互助的關係，其目的是防止德國侵略的再起，其性質是自衞的而非侵略的。莫洛托夫指出，美國在希臘的政策，才是干涉內政的行爲；史密斯在五月九日的補充聲明中，指責了蘇聯對於捷克的內政，有干涉的嫌疑，但是對於蘇聯指責它干涉希臘內政的一點，並未加以辯答。

美蘇之間的另一個歧異點，是蘇聯對於美國援歐政策的反對。史密斯說明美國在經濟上援助歐洲復興，並沒有威脅他人的意思。莫洛托夫表示，美國援歐如果純粹爲了增進國際經濟的合作，它如能在聯合國的機構範圍內進行，而且能够尊重他國的權利與主權，蘇聯非但不會採取消極的反對態度，而且由於它在戰爭中遭受着極大的經濟損失，對於國際經濟合作毋寧是抱着極大的興趣的。但是，他指出，美國對於西歐五國的軍事聯盟，是直接加以鼓勵的；美國在接近蘇聯的許多國家，佈置着軍事基地；美國對於美蘇商約所規定的美蘇正常貿易，並未給以保障，而且加以許多阻礙。這是說，蘇聯對於馬歇爾經濟援歐的計劃，是有它疑忌的理由的。

關於美蘇之間這兩個重要的歧異點，就雙方文件的措辭態度看，是相當心平氣和地加以說明的。這裏沒有了過去宣傳戰與神經戰中間慣用的火辣辣的攻擊指責的字句。這樣，這兩個文件，雖然只是說明了美蘇雙方的立場，表示着彼此都要求改變態度和解除歧異的希望，而還沒有進到建議直接進行談判的具體階段，但是它們在當前國際局勢中所起的澄清作用，是非常大的。

二

那麼，這次美蘇之間的文件，除了對於當前國際空氣的澄清作用以外，對於美蘇之間的基本關係，能否發生具體和久遠的影響呢？

關於這，我們應該先檢討一下促成這次美蘇交換外交函件的背景。

我們不容否認，從今年初以來到最近的期間，美蘇關係的冷淡和惡化，是發展得很快的。年初，杜魯門總統向國會提出擴軍的大預算；跟着，有空中攻

策委員會的建立大空軍報告書；此後，又有國務院發表的德蘇秘密文件；三月十七日，杜魯門總統又向國會提出了普遍軍訓與局部徵兵的報告書。這種種步驟，都是在强調反蘇反共的前提之下進行的。而在這期間，美國軍人的公然攻擊蘇聯，放言第三次大戰，更是肆無忌憚。在國際方面，對於義大利選舉，希臘內戰、以及朝鮮方面的發展，美國的每一步干涉行動，也都是利用着防蘇與反共爲藉口的。在這樣的情勢之下，美國輿論方面，差不多已把美蘇戰爭的可能，作爲一個公開討論的問題了。

這種討論的結果是怎樣的呢？我們不能忽視的是，除了一些軍人與最反動的議員的戰爭叫囂以外，比較穩健的評論家，都主持愼重。其中最顯著的代表，是紐約前鋒論壇報的專欄作家李普曼、紐約時報軍事記者鮑爾溫、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告」週刊的專欄作家勞倫斯（David Lawrence）；他們都是代表美國的大資產者和統治階層的，而且都是一貫地反蘇反共的，但是他們都認爲不能輕言對蘇戰爭，而應該和蘇聯各守範圍，同時並存。

紐約時報的漢遜·鮑爾溫是一個海軍評論家，他曾經抨擊海軍部長蘇立文的神經性的報告，說蘇聯的潛艇出現在美國海岸附近。他又强調地指出，一些軍人所認爲經過北極進攻蘇聯的路線，是不可靠的。

紐約前鋒論壇報在本月上旬連續發表了李普曼的幾篇論文，說明兩種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可以同時並存。李氏在本月六日指出，「大部分的歷史，證明幾種不同的制度在鬥爭之中，可以並存到幾世紀之久」。他引證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衝突，天主教與新教的衝突，一直繼續到了現代。他又把目前的國際衝突，比之於法國和沙皇時代俄國的衝突；而結論說，「外交家並不能造成一個世界，其中只包含着同樣思想的國家；他們却能使不同思想的國家，保持和平達一個世紀之久。」五月八日，李氏對於認戰爭爲必然不可避免的觀念，再發出警告，他說，「認爲兩種敵對的政府制度不能同時存在於一個地球上的觀念，是太天眞了。」根據李氏的論斷，目前美國的政策——援歐計劃、重整軍備、西歐聯盟等等——乃是爲了達到將來的談判妥協的一種賢明的準備而已。

勞倫斯和李普曼的立場是一樣的，他認爲蘇聯和美國可以各有其「勢力範圍」，各自發展，各不相犯。早在三月十二日，他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告」週刊中指出，「我們沒有理由單因爲蘇聯在巴爾幹擴展『勢力範圍』，而從事戰爭。『勢力範圍』的存在於世界，已有許多年了。……所謂『勢力範圍』，並不指一個國家因此而失去其獨立自由，也不一定指在鄰國的土地上建立基地，用以攻擊這『勢力範圍』以外的和平國家。」

三月二十六日，勞氏在一篇題名爲「沒有人需要的戰爭」的論文中，力闢軍事準備可以壓倒蘇聯的說法，他認爲美蘇之間，同樣存在着猜疑，他指出目前設法來阻止戰爭，還不算太遲，他這樣主張美蘇之間重開談判：

「請總統要求蘇聯政府派一個傑出的人民代表團，到華盛頓來。讓美國政府也派一個傑出的人民代表團，到莫斯科去。

「讓我們從頭做去。讓我們不要草率地詆責理智，說這是無用的。我們彼此繼續軍事上的準備，原是很自然的。這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們難道不能希望聰明的人類把面子放開，而尋出一條可以避免軍事衝突的道路，特別是讓雙方可以誠眞地和互信地對付着問題。

「這是值得一試的。」

不管勞氏和李普曼的論調，有許多是似是而非，這幾個代表美國統治階層中比較穩健一派的評論家，他們認爲兩種不同的制度，可以同時並存，雙方可以各守範圍，不必訴之戰爭，而在目前就應該進行談判，解決問題，這種看法和動向，是值得重視的。勞氏認爲「值得一試」的，美國政府果然一試了。

三

不過，上述主張美蘇協調的一派的主張，究竟能否貫澈呢？在莫斯科發表了美蘇雙方的文件以後，各方面的反響，究竟如何呢？莫斯科方面爲什麼未徵求美方的同意，先把文件發表了呢；在沒有充分的材料以前，我們的判斷是這樣的：

就美國內部而言，頑固的好戰派與穩健的妥協派之間的鬥爭，還要繼續下去。共和黨反蘇派的「外交權威」杜勒斯（Dulles）最近主張美國不但要反蘇，而且要把反蘇進一步擴展爲「全面反共」。對於最近美國一再傳說杜魯門與史太林將舉行會晤的謠言，民主黨參議員泰亭斯（Tydings）在廣播中主張總統應加以「堅決的拒絕」。不少反動的議員，如門特、楚特等等，都是死硬的反蘇派，而且主張美國對於歐亞各方面，都要實行軍事干涉。

由於這些頑固派和好戰份子的叫囂，杜魯門總統的態度還是猶豫不定的。同時，正如美國著名評論家約翰尼斯·史蒂爾在「論國際危機」一文中所指出，杜氏的打算是一面讓戰爭的恐嚇發展下去，一面試探對蘇聯談判的可能，而在危機發展到更尖銳的時候，他可能和史太林進行直接的會談；這樣他可能以「和平勝利者」的姿態回到國內，從而取得在大選中的勝利。這雖然是一種揣測，但這種可能不是沒有的。

也許是由於這種種不定的因素，使蘇聯認爲有將這次外交的函件加以發表的必要。其作用是把美蘇和平以至世界和平的需要訴諸美國人民以至全世界人民的輿論。因爲，祇有人民的力量，能使頑固的好戰派望而却步，使美蘇間的和平成爲一種眞正的運動。目前，美蘇關係的轉機還是在一個開端。靠着世界人民的力量，它是會好轉下去的。

一九四八·五·十二，上海。

西歐聯盟現階段

吳娛

一

西歐聯盟發展到現階段，已經描成一幅非常清楚的圖畫。在這畫面上，我們看到軍事的色彩特別濃，而對於經濟問題，則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併入馬歇爾計劃的歐洲復興方案裏去了。

近來，美國對西歐聯盟軍事支援的態度，已逐漸趨於明朗。上月廿八日，馬歇爾自波哥大泛美會議歸來，首次對記者透露國務院已在考慮對西歐聯盟簽字國作軍事性的租借援助。同時，又據消息靈通人士稱：杜魯門將要求議會把美國飛機大砲坦克車輸往受馬歇爾計劃援助的十六個國家，包括簽訂互助公約的西歐聯盟五國家。這些消息非但可能性很大，而且會馬上成爲事實，因爲軍事援歐似已成爲美國「反共」計劃中勢在必行的措施。何況集右翼政權大成的西歐聯盟各國代表及其擁護者，甘願處於馬歇爾計劃「小伙計」的地位。荷比盧三國早就認爲西歐聯盟應該和泛美聯防協定建立聯繫，因爲任何西歐聯盟最後一定需要美國軍事援助的。而英國名流卅二人（包括哲學家羅素在內），也主張立即成立一個包括西歐美洲及英共和邦在內的軍事聯盟。他們說：「泛美與泛歐的軍隊，至少應該像戰時艾森豪威爾將軍與亞歷山大元帥指揮時那樣的互相配合。」

把泛歐和泛美相提並論，把泛歐泛美在美國的軍事領導之下聯繫起來，使整個西歐從屬於美國，作爲像南美一樣的美國殖民地，這與美國的世界政策，正是恰恰相符合的。事實上，美國對於西歐各國，早就表示過類似的要求。美國副國務卿羅，特於三月間對法駐美大使討論西歐聯盟時，指出：「目前馬歇爾計劃正在遭遇西歐各國廣泛階層民衆的列強反對的時候，十六個國家必須採納美國援助方案的若干額外附加條欵，主要的是符合福萊斯特、巴魯區、和杜萊斯的最近聲明中的精神的、具有戰略性的那些條欵。」而阿姆斯特朗更坦白了，他除了表示「美國應要求每一個接受美援的國家，必須和美國締結軍事同盟」外，還進一步「要求在英國的各口岸，必須立即劃出美國海軍基地」。這個「讀者文摘」雜誌的編輯，就信口地把馬歇爾計劃的實質叫出來了。

二

上月卅日，西歐聯盟在倫敦舉行會議，開始共籌軍事資源，準備在獲得美國租借大批軍火後，立即加強集體行動。出席此次會議的有英法荷比盧五國國防部長與軍事首長，有人稱爲這是大戰以來最重要的一次會議。在這會議中，產生了一個軍事聯防計劃，包括了下列六點：一、速求武器的標準化；二、統一訓練制度；三、交換軍事上之發明與情報；四、擬訂各國所應提出一部份兵力以備行動的數額；五、設立空軍基地網；六、組織最高指揮部，由各國派遣代表參加。

看了這個計劃，幾乎令人疑是泛美聯防公約的翻版。所不同的，南美各國一向是屬於半殖民地性質的國家，工業落後，根本沒有與美國爭奪資本主義世界霸權的資格，所以，美國與泛美各國之間，似已在泛美軍事聯防公約中安排好「主從」的關係，矛盾倒不尖銳。至於西歐聯盟，就多少不同。英法荷比盧都是工業相當發達的國家。尤其是英國，在過去數百年間，它一直

老闆和小伙計（美國「民族」週刊）

是歐洲的雄獅，世界的霸主。經過這次世界大戰以後，雄獅雖然變成衰獅了，但它並沒有衰弱到一蹶不振的程度。它還有力量，它時刻不忘恢復帝國的威望，美國對它，是不像對泛美各國的易於控制的。而且美英都是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國家，它們都需要爲商品輸出找尋銷路，所以，在爭奪殖民地市場的問題上，它們之間的利害衝突尤形尖銳。只有在反蘇反共反民主的場合，它們才趨於一致。目前，在一致「反蘇」的前提下，英國接受了美國軍事經濟的援助。可是英國實質上儘管一步步接受美國的控制，她却並不甘心服從美國的世界領導權。不管行得通與否，英國似乎懷着一種深沉的策略。三月間，英國外交部正式提出聯防的新建議時，「英國原擬與荷比盧分別單獨訂立軍事條約」。但後來又表示遷就，允訂一總約。這顯然是因爲荷比盧三國對英國軍事實力表示懷疑，同時也由於美國的壓力，因而要求簽訂一總約。所以，在訂約後，他們表示「第二步將設法取得美國確實保障於必要時出兵相助」。三國的態度，無疑對美國是有利的。但觀英國企圖與三國分別單獨訂約的用心，原是由於便利英國個別地加以操縱的緣故。如果英國能夠控制三國的軍事，還怕孤獨的法國不聽命於英國嗎？如果西歐自成一個鞏固的集團，就可逐漸把美國的勢力排斥出去，英國無形中成爲西歐的盟主了。這樣，才符合邱吉爾多年倡導西歐聯盟的苦心，也才是不久以前英國提出軍事聯防的本意。然而，力不從心，英國希望終於幻滅，英國終於不能不暫時讓美國牽着鼻子走了。但從這裏，我們却可以看出西歐聯盟的不穩固性。由於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強權者間的聯盟總歸是不穩定的，何況西歐聯盟，只是雄鷹控制下的一羣狼的結合呢？

三

西歐聯盟爲什麼在目前把軍事問題提到重點上呢？表面上，自然是爲了對抗蘇聯、對抗東歐新民主國家。英國的外長艾登說：「西歐聯合一致是對共產主義的眞正答覆」。但事實上，那就連美國共和黨參議員塔虎脫都說：「迄至目前爲止，蘇聯只不過在雅爾達協定所確認的蘇聯勢力圈內，鞏固其地位罷了」。究其實，西歐聯防與其說是爲了反蘇，不如說是爲了反人民——包括西歐以及各國所屬殖民地的人民。因爲在這次大戰後，人民的覺醒程度普遍地提高，也空前地強大了，非特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如風起雲湧，就是西歐各國的人民也廣泛地展開反榨取反資本家的鬥爭。加以在義大利四月選擧之後，緊接着法國也要舉行選擧，法國的人民力量是比義大利尤其壯大的，這對保守的統治者們無疑又是一個最感棘手的難題。在優劣分明的形勢之下，失敗者更情急了、也更殘暴了，他們認爲非把各國的軍事力量聯合起來對付不可。泛美聯防的第一砲，的的確確是打擊在人民的頭上了。這事實，無異是給西歐人民一個最好的足資警惕的先例。所以，最近英國明白地指出：「美國和西歐各國成立軍事同盟，即要犧牲英國和西歐各國的人民去完成它的作戰計劃」。而英法荷比盧的共產黨亦共同發表宣言，號召該五國的工人及和平贊助者「一致反對最近簽訂的軍事聯防公約。」由此可見，西歐聯盟的前途是困難重重的。

五月八日

分裂政策下的南韓普選

袁孟超

槍刺下的普選

據路透社漢城八日電，在美國分裂政策下所導演的南韓普選，「原定九日，嗣以九日適逢日蝕，認係不祥之兆，故决改在十日舉行」。但對「不祥之兆」，仍存戒懼，藉口「北緯三十八度以南將普遍發生暴動，以武裝警察六萬人及志願民團一百萬名，分在城鎮鄉村駐守，保護候選人、選民、選舉事務所官員及投票所」。以漢城一地而論，自十日拂曉起，有七千名武裝警士，一千五百名特別衛隊及九千名自衛團擔任警戒。這是多麼强大的警察南韓，無怪佔領南韓的美軍總司令霍奇將軍，大可以向美國垣街的老闆和杜馬之流，誇耀他建立警察國家的赫赫之功。更無怪舊金山十日廣播的漢城訊，雖强調了佔領軍和警察是如何强大有力地逮捕、屠殺並鎮壓了人民反對普選的暴亂，也不能不承認「朝鮮婦女却一反往常，卸去假日一向喜穿的鮮艷服裝，改着黃白色的衣裳，負嬰挈孩地排隊投票，爲狀都很侷促不安」。這便是佔一半選票以上的婦女投票的情况。

因此，路透社在報道漢城十日情形宛若一座要塞，街角均架起機關槍，武裝警士在街中川流不息地巡邏，每一投票所職員，亦均攜械防身。而揭示首先開票結果，李承晚及其他右翼候選人十一名，在毫無對手的局面下均告當選之後，也要慨嘆「觀察家所引爲遺憾者，乃爲參加競選的候選人並未能代表南韓各方面之意見，全爲極右派人士。連原有右派的金九及中間派的金奎植亦均非候選人。」再，中央社的專電也說「南韓之選舉，並非西方民主國家與共產主義間之鬥爭。因二百零九名全部候選人，均爲右翼份子或反共份子。」並確切指明「此次乃對李承晚及韓國民主黨領袖金性洙二人力量之測驗……金領導之黨員多屬富有階級，甚多韓人指責渠等爲親日派。」而李承晚呢？據他接見合衆社記者時說：「一等到我們的政府得到國際的承認，我們就要求蘇聯退出，而請美軍繼續留在朝鮮。」

由於這些事實的報道，也就不難明白所謂南韓普選也者，不過是更暴露了帝國主義、法西斯警察反抗朝鮮人民民主解放的嘴臉。讓擴張主義者的論客和戰販，以及殖民地的買辦奴才去叫囂「美蘇强權政治的鬥爭」罷，南韓和全朝鮮以及全世界的人民，是能够認清這是在誰的槍刺下舉行「普選」。



槍刺下的自由　（蘇聯「新時代」周刊）

誰在分裂朝鮮

朝鮮問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由於盟國的合作，開羅會議和波茨坦宣言，都早已有過原則的决定。最具體的决定是戰後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的宣言。「决定中蘇英美四國，保證重建朝鮮爲一民主統一的獨立國家。」因此，必須根據民主原則，迅速消除日本長期在朝鮮統治所造成的惡果，爲成立一個臨時的民主政府，首先造成所必要的條件。規定了必須經過美蘇兩國的「五年託治」，其實，這個决定的主要目的：一面是在培植朝鮮本身的民主力量，同時也可消除美蘇間的對立形勢。

但自一九四六年開始以來，美國便一直在破壞莫斯科會議的决定，企圖由分裂朝鮮以達成獨佔，更暴露出美國的朝鮮政策，簡直就是日本殖民地政策的繼續。於是，美蘇佔領當局組成的聯合委員會，在一九四六年三月的第一次會議上，美國代表首先就提出了違反莫斯科會議决定的美國建議：對臨時政府的組織程序，主張以美軍司令霍奇所領導的南韓「民主委員會」爲主，加上北緯的黨派及團體，合組一個「諮詢機構」，與美蘇聯合委員會商談

建立臨時政府問題。再就是建議對朝鮮政府機構、以及中央經濟機構，概由美蘇聯合委員會代爲組成。由於這類的建議旣違背了莫斯科會議的決定，對朝鮮人民的意願又採取了直接的干涉，致爲蘇方拒絕，會議因此擱淺。

去年五月再度開始的美蘇聯合委員會的談判，又因美方代表主張：不問是否代表人民意志，和有沒有羣衆基礎，只要是朝鮮的黨派和團體，都一律參加對朝鮮問題的商談。其意顯在扶植反動勢力，以樹立美國在朝鮮的特權。經蘇方反對之後，會談延至七月又陷僵局。於是，美國復於九月提出建議，主張朝鮮問題改由中蘇英美四國解決。甚至利用美國在聯合國的「多數」，不顧美蘇協議朝鮮問題的原則，將朝鮮問題提出聯合國大會，竟至成立了「聯合國朝鮮委員會」，以對抗蘇聯代表團堅持朝鮮人民代表參加聯合國大會，以及在一九四八年撤退美蘇駐軍的兩個提案。現在代表美國在南韓督導「普選」，以加強朝鮮分裂的，正是這個「聯合國朝鮮委員會」。這顯然是藉了聯合國的幌子，掩飾着對朝鮮內政的直接干涉，以完成分裂的朝鮮，好作進一步的獨佔。

至於霍奇將軍代表美國統治的南韓，則更有驚人的表現。在政治上，把南韓變成警察統治的局面，以武力鎭壓羣衆的集會會和遊行、搗毀民主黨派的報紙、大批拘捕民主人士，並暗害民主團體的領袖。對南韓反動派的鼓勵，不僅支持美國一手豢養的奴才李承晚，並連人民所指斥的親日派金性洙，也大加寵愛。致令原爲右翼的金九和中間派的金奎植等，也痛感美國的統治和日本帝國主義時代的朝鮮不僅相同，並較日本對朝鮮人民的奴役尤爲陰險。而毅然決然地參加了北朝鮮在四月二十三日召開的南北各政黨聯席會議。兩氏返回南韓後，不僅拒絕參加霍奇導演的「普選」，甚至對記者發表談話，宣稱「此行已滿足渴望祖國統一之大部份韓人的期望」。金奎植並稱「蘇聯在北韓的統治，其情形較南韓爲佳。蘇聯聽令人民自由，而美國則在南韓干涉一切，且信任自日人方面學會貪汚之韓人。」

經濟上，美國更在南韓繼續着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以美國的「新朝鮮公司」代替日本過去的「東方拓殖會社」。美國除了以「新朝鮮公司」控制許多工業和企業，使南韓仍舊保存着殖民地的特徵而外，並以所謂「美韓土地公司」連同舊有地主和朝鮮賣國賊親日派，共同擁有南韓三分之二以上的土地。而佔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之無地的窮苦農民，只能收得三分之一的穀物。農村中舊有的半封建關係，日本統治時代的土地抵押制度，都重新得到美國的支持。

同時，並在南韓設立陸海軍部，以美械裝備軍隊，並由美國軍官訓練。在軍事佈置上，改造並修建陸海軍基地，擴展飛機場。使反動份子深信南韓政府成立，更可以獲得大量的軍事和經濟的美援，用以發動內戰，奪取北韓。在反動派的心目中，華盛頓之以七千五百萬美元援助南韓，不過是事情的開端。這和造成單一的南韓政府，都是美國政策的必然，因而得意狂歡。

美國之重視朝鮮，不惜破壞莫斯科會議的決定，顯然是在攫取朝鮮的若干資源，建立擴張主義的基地，造成壓迫遠東民主運動的中心。

强有力的民主陣線

美國蓄意分裂朝鮮，在她的政策上，固屬必然。但解放後的朝鮮人民，是決不能忍受這一付新加上的鎖鏈。不僅北韓已樹立了堅強的民主的堡壘，就以美軍一手控制下的南韓而論，連原被誘惑過的金九和金奎植等，也都決然地加入了朝鮮人民的「民族民主統一陣線」，四月廿三日在平壤舉行的南北各政黨聯席會議，很顯然地證明了分裂朝鮮政策的破產。在參加會議的四十六個單位五百四十五人中，包括南韓的政黨和團體有：韓國獨立黨、社會民主黨、全國勞働者評議會、民族民主同盟、民族婦女同盟、建國青年會等擁有羣衆基礎的強大組織。在會議中，一致反對「聯合國朝鮮委員會」在南韓導演的非法選舉。並組織了「全國同胞反對單獨選舉鬥爭委員會」，要在各城鎭成立分支會，抵制選舉。同時，還通過重要的決議：（一）建立南北朝鮮統一的中央政府；（二）爲要求美蘇軍隊撤退，送致美蘇兩國的公函。這正證明了朝鮮人民爭民主的力量的團結和壯大。

至於霍奇一手創造的警察南韓，和美軍及反動派李承晚與金性洙等所採取的屠殺和武力鎭壓，在十日開始後的「普選」中，並不能完全控制住各地人民對「選舉」的武裝反抗。同時，像濟州島那樣的地方，竟無一人投票，對槍刺下的選舉，採取了消極的抵抗。

其次，在美日聯合以武力鎭壓下的日本韓僑，也羣起反抗強迫韓僑學校採取日本的教育制度。縱然美國佔領軍第八軍出動逮捕，並指揮日本警察出動彈壓，但自四月廿五日起，韓僑的反抗竟然已自神戶蔓延到大阪，最後也還波及到東京。

這一連串的事實，一方面暴露了強權者企圖奴役朝鮮國內外人民，把朝鮮當作殖民地統治的蠻橫殘暴，正和日本帝國主義時代的統治一模一樣。另方面也同樣證明了朝鮮人民的覺醒，朝鮮人民民主力量的日益堅強和壯大。

時代在前進，人民也在前進。時代拉不住，人民的力量是「沛然莫之能禦」的。

國際內幕

美國軍人怎樣控制外交

——蘇爾斯與他的「國家安全委員會」

伯箎

最近幾個月來，美國各方面充滿了一片戰爭的喧囂。在一般人民感覺到驚惶與苦悶的中間，政治上敢說敢言的人物，像華萊士等，已經直率指出：美國的政治和外交完全落在軍人手中了，因而走向戰爭的危險傾向，也越來越明顯了。這樣對於軍人干政的抨擊，漸漸使美國人民注意到政治內幕的事情。

美國的著名廣播評論家史蒂爾（Johannes Steel）在三月份的「世界事情報道」中，曾經指出一個事實：今天決定美國政策的，其大權在國防部長福萊斯特，而不是在國務卿馬歇爾。這話似乎使人不能相信。但是，史氏補充一個事實，即：美國今天有一個軍事與外交的決策機關，名為「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而在這重要的委員會中，代表馬歇爾的國務院的，只有一個人；至於代表福萊斯特的，却有四個人。這也就是說，馬歇爾在美國軍事與外交的決策上，只能佔五分之一的力量，而福萊斯特却佔五分之四。史氏又預言，如果馬歇爾在美國擴軍備戰的政策上跟不上福萊斯特，他可能被福萊斯特取而代之的。

究竟這個所謂「國家安全委員會」，是怎樣一個機構呢？我們必須從一個機構，明瞭美國軍人控制外交的真相。

所謂「國家安全委員會」，原來只有六個多月的歷史，所以在美國內部和國外，知道的人是不多的。然而，這一個短短歷史的機構，在美國政治上確是握有極大的權力的。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任務，據說是要使美國所宣布的外交政策，和美國所保有的軍事力量，趨於一致。換句話說，美國的外交政策的執行，必須以軍事力量為後盾。這樣，軍事決定外交，美國外交的受制於軍事，從這一委員會的任務中間，已經說得非常明白了。

這個委員會是怎樣組成的呢？它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委員會的上層組織，它包括美國政府的七個首長，即：杜魯門總統，他是委員會的主席；國務卿馬歇爾；國防部長福萊斯特；陸軍部長羅雅爾；海軍部長蘇立文；空軍部長薛明敦；和國家安全資源局局長希爾。二是執行實際工作的組織，負責者有五個人，他們是：

一、凱南（George F. Kennan）——他是國務院的代表，也即是去年以「X先生」的筆名在「外交季刊」發表美國反蘇政策的人物。他認為對蘇實行長期的「圍困政策」，可以「使蘇聯自己崩潰」的。

二、魏德邁中將（Albert C. Wedemeyer）——他是陸軍部代表。魏氏做過美國在華派遣軍的首長，去年曾來華考察過。他是以反蘇反共著名的。他所主張美國對華軍事干涉的政策，比之馬歇爾，還要急進。

三、諾斯太特中將（Lauris Norstad）——他代表空軍，是一個青年軍官。

四、史塔耶海軍少將（C. W. Styer）——他代表海軍部，官職是海軍作戰部代理副部長。

五、希侖柯脫海軍少將（R. H. Hillencoetter）——他是中央情報組的主任，代表美國的軍事情報機關；這機關事實上屬於「國家安全委員會」的。

除了上述的五個實際負責者以外，「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執行幹事，是一個名叫蘇爾斯（Sidney W. Souers）的神祕人物。他以前是聖路易的大商人，後來又做過海軍的後備軍官，在海軍方面專負責情報工作，是福萊斯特最親信的人。我們當記得，福萊斯特在現任國防部長以前，曾經担任過海軍副部長和部長的。

這個委員會是怎樣執行它的工作的呢？據說，當總統或者國務院或者陸海軍部要求得到對於某一地域或某一重大問題的意見時，首先是由中央情報負責人希侖柯脫少將綜合他的情報材料，對於某一地域的情況，作一個報告；報告中特別注意到各方面對於某一問題的意見，以及輿論對於美國所採行動的反響。這些材料，再經過五個實際工作負責人的討論，然後把意見和結論帶回他們各部的上層負責人去。在討論中間如果有分歧的意見，則由蘇爾斯加以解決。

當這五個實際工作者考慮過一切的材料和意見，決定建議採取一個外交行動的時候，「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本身會議，才正式舉行了。會議地點通常是在白宮的內閣室，由杜魯門主席。蘇爾斯是經常提供材料和參與決定的人，他差不多每天都去白宮，和杜魯門總統接觸到的。

關於蘇爾斯這個人，這裏還應當多介紹一下。他生於哇海俄州的台頓地方；在米亞米大學受教育

；担任過紐奧倫的報紙工作；在聖路易經營過保險業。一九二九年，他加入海軍担任後備役；從一九三二到四〇年，他是聖路易地方的海軍情報軍官。一九四〇年，他正式被徵服役，最初在中東担任情報工作，後來去華盛頓，才見到海長福萊斯特，大受賞識，而被一手提拔起來。第二次大戰終了時，他已是海軍少將，和海軍情報處的副主任了。

戰爭結束後，他幫助改組了美國的情報組織，成立了原子能委員會的情報組織。由於福萊斯特的建議，杜魯門總統任命了他做「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執行幹事(Executive Secretary)。他的助理幹事是萊氏(James S. Lay)，也是一個情報專家。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辦公處是在國務院原來的大廈，和白宮隔着一條街。由於這樣便捷的關係，更由於他職務上的需要，蘇爾斯差不多每晨都去看杜魯門總統，每個星期中間，至少有幾天他和總統及白宮裏的其他首腦人同吃午飯。在這種會晤中間，李海海軍上將（William D. Leahy）大概都是在場的；他是總統的個人參謀長和外交顧問。有人說，美國今天的外交政策，離不了李海上將和福萊斯特兩個大軍人的影響，這話不是無因的。

「國家安全委員會」這個機構，雖然成立未久，知道的人也不多，但由於它對於美國外交政策的決定影響，它已經受到評論家的注意和批評了。最重要的批評，就是這樣一個決策機構，完全被軍人所把持着。國務院是參與這一機構的唯一文官組織，然而國務院的負責者，在今天還是一個軍人——馬歇爾將軍。至於執行工作的負責人，個個都是陸海空軍的高級軍官，更顯示今天美國的政治和外交，已經染着濃重的軍人色彩了。

軍人干政，是這次大戰後的一個流行病。美國會經拿這毛病來批評中國政府。然而，諱病忌醫，美國自己也是一樣的呢。

封面圖解

美國的世界基地

昌闓

本期封面地圖，顯示着今天美國的世界基地。該圖轉載自蘇國"Soviet Russia to-day"雜誌，說明原文題作「美國的章魚」（American Octopus），圖上的粗黑線，恰構成了章魚的形相。

箭頭一、二、三、四、五指的是美國在極北——加拿大、拉布剌達(Labrador)巴芬蘭（Baffin Land）的形勢。就加拿大一地來說，美國在畢蒂克登（Penticton）、喬治親王（Prince George）與愛特門登（Edmonton）等地築有空軍基地。紐芬蘭的波特胡特（Botwood）是向英國租來的，在北極圈內而且還有實驗基地。一九四五年冬季「犛牛戰術」測驗了美國在北極底配備和格蘭特蘭（Grand Land）的美加軍隊。

箭頭六、七所指的是軍人所鍾愛的阿留申羣島和阿拉斯加。這地方早存在有許多基地了，可是現在軍事當局又曾要求擴充新的地區給他們管轄。阿拉斯加的雷達基地、機場和訓練站上正在化去一千八百二十五萬鎊的鉅款。在過去二年中，在這戰略地區實施了的各種不同的訓練與偵察計劃，舉行了「寒帶」「冰山」與「育空河」的演習。箭頭八所指的是丹屬格陵蘭，在這裏美國仍保留着重要的基地。冰島（箭頭九）已經因爲美國的一個空軍基地仍在賴克雅維克(Reykjavik)而提出抗議。箭頭十、十一、十二、十三所指的就是整個西歐的最重要的地區。是對蘇戰爭時的「原子墊子」地帶。

＊

巨額金元正在源源地流注入這些重要的地區，華盛頓方面還以租借軍火方案爲助，對西歐提供了軍事的保證。國會議員最近已經開始要求歐洲的基地了。他們也要求爲了報答馬歇爾的美元，這些國家所控制的戰略性的原料應該輸往美國，供養美國的戰爭機構。

美國海外部隊最大的集合地就在西德這地方，馬歇爾正在把它組織成一個受美國控制的、反社會主義的國家。目下在這個區域內的主要紛擾場所，便是的里雅斯特港、奧國、義大利和德國。西班牙是爲着允諾在戰爭時供給基地而獲得美援的。

＊

箭頭十四把我們引到了南極圈，去年夏天美國派了大隊的海軍遠征軍去研究零度下的氣候條件和測驗戰爭的材料。箭頭十五爲非洲和最名貴的物資—鈾鑛。這是在比屬剛果發現的，每一盎斯鈾的發掘都被運到美國。美國在非洲海岸的里比利亞也有權益，這保證了美國對於那個國家的控制。

箭頭十六、十七、十八所指的是地中海。在這裏據華盛頓發言人的談話，美國似乎不需要擁有什麼自己的基地，因爲英國的基地隨時可供美國之用。然而目前美國卻在地中海中永久地維持着強有力的海軍，那是爲了美國外交政策的需要而派去對的港、希臘與義大利實施壓力的。在北非沿岸，美國現在正在興建梅拉罕（Melaha）的主要的基地。在希臘，它維持着一個龐大的軍事使節團和大量軍火來作爲對外軍事政策的一環。

＊

箭頭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指的是中東和油田，這地區是美國巨額投資統治的場所。土耳其正在受着美國的武裝配備，她的軍隊正在受着美國軍官的訓練。伊朗的軍隊也是美國所控制的，基地正在建築起來，保護沙地阿拉伯的廣大油田。伊拉克是英國的獵場，可是美國也擁有極可觀的權益。

箭頭二十三、二十四是日本和朝鮮，美國戰略家所認爲這個地區將成爲東方對抗蘇聯的主要跳板。麥帥正在慘淡經營一個反動的日本。在美國的駕御下，日本將死心塌地的從事遠東的軍事冒險。美軍佔領下的南韓民主政治被扼死了，那些替日本人効勞的人們又重新掌握了政權。

箭頭二十五是中國。

箭頭二十六指的是菲律賓。在這裏有二十三個軍事基地，租借時期是九十九年。協定簽訂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菲島駐有美軍三萬名。

箭頭二十七是太平洋各島嶼。太平洋中有六百多個島嶼，是從前日本所委任統治的。其中有幾十個已作了美國的海軍和空軍基地。

美國海軍在馬紹爾、馬里亞納、加羅林諸羣島已都加以部署和配備了。

話說戴高樂（上）

蘇 Minayev 作　史煉 譯



戴高樂的傳奇

第二次大戰以後，法國的政治情勢起了極大的變化。反動派被民主力量迎頭痛擊。二百家的統治受了嚴重威脅。今天，財政寡頭又圖死灰復燃，以重獲已失去的地位，並復他們的失敗之仇。

猶如德國和義大利，法國的獨佔資本家正在法西斯主義中尋找逃生的場所。

法國法西斯主義的標誌——戴高樂主義——和希特勒主義的出生與發展，有許多相同之處。法國的豪門以戴高樂爲後盾，正如德國鋼鐵與煤炭大資本家依附希特勒。甚至從這兩個領袖的經歷，他們的個人野心和自卑病態的混合中，也可找出相像點。

從方法上說，戴高樂實質上和希特勒是同一的。他有和希特勒同樣的趨向，把他自己描寫成一個由上帝所派遣的民族的救主，他同樣也有濃厚的極端愛國主義和豔麗的權力政治的裝飾。

當然，戴高樂所處的國內外形勢，比起納粹當時所處的是要複雜得多了。戴高樂和英美帝國主義份子的聯合，比希特勒剛開始他的生涯時，要直接而且親密得多。

戴高樂是誰？誰「發現」戴高樂的？這是一個在報紙上常常有人提出的問題。有人把戴高樂描繪成一個神祕的人物，也有人把他看作是英雄；有人說他是一個在浪漫主義和政治之間暗中摸索的人；也有人仍舊對他看成是一個坦克戰爭的理論家。事實上，戴高樂倒更像曾經一度膾炙人口的劇本「精剪的燕尾服」（The Well-Cut Frock Coat）裏一的個英雄——一個狡黠的冒險者，他靠着穿了一件樣子極好的別人的大禮服，而爬上了社會高層。如果我們檢驗戴高樂的一生，那麼我們將會發覺，每一件他所穿的衣服都是別人的。

除了一顆無饜的野心，戴高樂根本沒有天賦的特殊的智能。當他還是年青的官吏時，他就已開始「釣名沽譽」的努力。當第一次大戰時，他曾被俘，在德國居留了一個並不光榮的時期。後來被釋回國，就到波蘭，在畢蘇茨基的反蘇冒險中當一名志願兵。這裏他設法贏得福煦元帥參謀長魏剛的信任，魏剛是被法國政府特派到華沙指揮波蘭軍隊的，他因此而成爲畢蘇茨基部下的至交。從波蘭，戴高樂帶回了波蘭元帥的法西斯方法。

在法國，作爲貝當的一名屬員，戴高樂儘他最大的可能使他在軍隊中建立起他的威望。他缺乏創造的靈感，但他天生有看風駛舵的脾氣。一九三〇年，戴高樂開始宣傳他的大量裝甲配備的「職業軍」的思想。他的著作表現了他的軍事愚蠢。他寫這本書的動機是由於貝當向他建議，必須擁有一個配備精良的軍隊，以準備一個一呼卽應的政變。戴高樂的著作並沒有在軍界中引起大影響，因爲他的思想全非新奇或有獨到的見解：它早已被馮·西克特（Von Seeckt）及其他德國將軍們完全看破了。這個不幸的坦克戰爭「理論家」的其他著作，也都是別人見解的翻版。

不管他如何的巴結貝當，戴高樂在軍事的階梯上爬得非常慢：他在軍隊中服務了三十年後，仍只落得一個上校的銜頭。

於是到了一九三九—四〇年。說句實話，他和別的貝當份子一樣，從來沒有想到抵抗納粹的侵略。他情願當一個法西斯主義煽動者的角色，請求法國政府撥給他一枝摩托化的遠征軍，幫助芬蘭白黨向列寧格勒進軍。

這個行動是戴高樂特性的具體表現。戴高樂親法西斯的傾向在戰前就有一連串的事實可資證明。他是法德委員會——納粹在法進行反法活動的主要中心之一——首領的密友，當這個委員會將他的著作「未來的陸軍」（The Army of the Future）在德國出版時，他竟搖尾乞憐了。他一點沒有顧忌到他們所以要出版這本書是有着十足明確的目的，卽是他將法國完全沒有戰爭準備的事實，原原本本向德國軍官們揭露了。法德委員會給予戴高樂一筆極豐富的酬金，爲了他供給納粹間諜和宣傳的這些寶貴的資料。

所有戴高樂交往極密的都是希特勒份子，他們也就是產生貝當政權的人物。他和貝當元帥的第一副官勞斯達納拉卡（Loustanau-Lacau），德國的情報員和卡哥拉（Cagoulard）陰謀案的製造者之一，友誼很好。在由貝當任委員長的國防委員會中，戴高樂當了總書記。他充分支持貝當在法國國防上的頭等重要問題的政策。我們知道這個政策是充分便利了希特勒的。他們倆都反對擴展法國的空軍和鞏固法國的北疆。

當戴高樂最後開始向他個人的道路猛進時，法國已經站在災難的門口了。他接受了熱切渴望着的將軍的稱號，並被任陸軍部次長。在這個新職中，他主要工作是擔任法英雙方司令的聯絡。戴高樂這時期的活動極爲簡單，但是對他卻是大大重要的。他在倫敦化了不到一星期的時間。就在那兒他和邱吉爾相識了。

這是戴高樂參加最不顧死活冒險準備的一個試驗，這一試驗決定了他的命運。戴高樂被邱吉爾「發現」了。邱吉爾也對戴高樂的其他特點印象極深：他的最反動的觀點、他的「高貴的品質」和他與天主教保皇派的密切關係。

事情迅速地。六月十六日黎明，當戴高樂在法國「陪都」波爾多（Bordeaux）的機場着陸，他發現史比爾斯（Spears）將軍正在恭候他。這個今天活躍在中東的經驗豐富的情報員，那時是邱吉爾駐法代表。斯比爾斯奉邱吉爾之命，要戴高樂立刻回到倫敦，對這一個命令戴高樂毫無異議的照辦了。當天，六月十六日，戴高樂乘英國的軍用機飛回倫敦。那兒一個預先安排的節目正等待着他。邱吉爾在和他的正式會談中，告訴了他。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八日，太空中震響着這樣的字句：「我，戴高樂將軍……」，在這個唐寧街編成的「對法國民族的懇求」中，是並不缺乏爲愛國主義和一個「對敵人無情鬥爭」的熱情和雄辯字句的，戴高樂向法蘭西人民介紹了這一個「戰鬥法國運動」的新角色。他的主要武器就是BBC廣播電台。

當戴高樂正在電台中練習他的修辭學的時候，在法國，眞正人民的愛國力量，由職工會的法國共產黨和民主份子領導正給敵人第一個痛擊。法蘭西，被她的統治

羅馬天主教會與法西斯主義

美·Paul Blanshard作　芝　益譯



一

美國輿論界在討論四月十八日舉行的義大利選舉事件時，幾乎完全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卽右派如獲得完全勝利，梵蒂岡將建立何種性質的政府。

梵蒂岡想使一個保守的、親天主教的政權上台，是很顯然的事。它在歐洲政治中已不再企圖掩飾它的黨派地位，在義大利，牧師已完全忽視拉脫蘭（Lateran）條約中關於禁止牧師從事黨派政治活動的規定，而在告訴民衆應如何選舉及在何種情形下拒絕選舉。紐約時報記載說，米蘭主教許斯脫（Schuster）已把參加左派會議的一個牧師逐出教會，並訓令他教區內的牧師「對於共產黨員與參加違反天主教的運動之人」均不許赦罪。

三月三日的聯合社電訊說，義大利南部十八個大主教與五十五個主教印發一封教書給他們的信衆，信內說「沒有一個人能在同一時候做一個好教徒與一個社會主義者」。布洛克林書簡報（Tablet）的羅馬電訊說：「已動員四百五十萬義大利天主教行動會的會員，以確保基督教民主黨的獲勝而擊敗共產黨與左翼社會黨所合組的人民民主陣線。」紐約時報說：「數千的鄉村教區牧師正集中他們的努力力量於女選民身上，一般人均視女選民比男選民更信奉天主教。」

教皇庇護士第十二是一個機智的政治戰略家，他可能很確切地瞭解他這樣公開支持保守派的用意為何。就西歐各國所負的責任來說，他認為在他反對共產主義之時，他可能失去機會，他注意美國的輿論，而美國人民早已在共產黨所造成的慌亂中把法西斯主義忘得一乾二淨了。事實上戰後的美國似深受情緒疲倦的痛苦，以致不能集中全力去同時追索二個惡徒。

二

目前法西斯主義一字已被任意濫用，由於這問題的重要性，關於羅馬天主教會及其對法西斯主義的過去關係，實值得我們提出幾個基本問題來研討一下。教會是法西斯主義者嗎？它曾在實際上反對過歐洲的法西斯主義嗎？自從戰爭以後它已改變了它的態度嗎？為了有效地抵抗共產黨的侵略，我們就可暫時忽視教會對法西斯的關係嗎？我們能夠信賴梵蒂岡在歐洲的任何勝利足以擴展民主政治嗎？

我將引用教會方面有關的材料來回答這些問題。我確信美國的數百萬天主教徒都會贊同天主教作家替林（William Taelling）的說法，替林於一九三七年「教皇庇護士第十一與國際事件」一文中說：「羅馬的政治政策似已日漸與極權主義的組織相同。羅馬認為與獨裁者合作為聰明，這在極力反對獨裁制度的民主國家看來，則很不高興。」

美國的天主教階級對於此種批評特別敏感，因為他們都認法西斯主義為犯罪行為。為了克服此種罪行的意識，他們就製造荒唐而毫無根據的事實，說梵蒂岡是反對法西斯的。一九四四年天主教新聞處印行的「教皇是法西斯主義者嗎？」一本小冊子中說：「無可爭議的，在一九三九年以前，教皇是勇敢地與堅決地反對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主義二大罪惡的唯一世界領袖」。

這本小冊子大約是表明梵蒂岡不是法西斯的有力證明，可是它並未提到佛朗哥、阿根廷、蒂莎、阿比西尼亞戰爭或職團國家；所引用的教皇言詞不但忽視這些問題，而且也未提到民主、獨裁原則或墨索里尼與希特勒摧毀民主黨反對派的方法。這本小冊子與庇護士第十一和第十二兩個教皇都忽視歐洲最堅決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偉大勢力——社會主義運動。小冊子雖說教皇勇敢地與堅決地反對法西斯主義，但其中沒有一句引語是特別勇敢地與堅決地斥責這二種法西斯主義，獨裁政制與職團國家。祇有一個例外，即教皇對於墨索里尼與希特勒侵害教會的教育與政治權，曾予以攻擊。

該小冊子所說的某一點自然是正確的，即教皇並非「完全」為法西斯主義者。沒有一個教皇會站起來公開

者所戰勝和出賣，但是並沒有被鎮壓住，都貪婪地傾聽着戴高樂的廣播。每一個忠實的法國人都全力支持戴高樂，法國人民信仰他的愛國主義。這樣便使邱吉爾在倫敦所製造的戴高樂傳奇傳遍了世界。他的演說被英國電台和法國反動派所傳播。我們在後面將要看到，柏林也曾實過不少力呢，戴高樂成為一個無人不愛的人物了。

戴高樂是邱吉爾手中一個馴服的工具。當戴高樂必要和貝當脫離時，他就毫不猶豫地將他過去的恩人一脚踢開。貝當勃然大怒，把戴高樂處以缺席的叛國罪。這實在太幫助了已經流行了的傳奇，這一個傳奇說戴高樂是反法西斯和救亡鬥爭的大豪傑。

當他留居在倫敦的早期，戴高樂似乎對政治毫無所感。他再三宣佈他唯一目的是重建法軍，特別是在英國的領土上重建法軍。這唯一的目的，在戴高樂和英國政府的協定中，也早可見到。後者自從在鄧扣克大敗，幾乎沒有軍隊，她需要用戴高樂補充他國內和中東的新軍。

然而實際上，戴高樂在這個時期的努力，是完全集中在一個「最高統帥」的慾望上。他設立了一個參謀部，最上面有一個間諜及反間諜的情報處。在這裏他有法國反動派的援助。許多眞正的法國愛國者到英國來，卻極少能在戴高樂的下面找到一個職使。就是假定有幾個人曾經找到的話，那不過是因爲如果沒有和法西斯完全沒有合作和連繫的清白的名字，那麼由著名反動份子所領導的「戰鬥法國運動」就將被人大加懷疑了。

戴高樂的參謀部在法國政論家的著作中被描寫得活龍活現。凡是由盟國情報處和法國反動派所推荐和介紹的人，戴高樂無不舉手歡迎。主要的角色在「法國的掘墳者」一書中已經寫得很詳細。戴高樂被一羣政治冒險家、地痞、無國家觀念的間諜、搖筆桿的政客和普通不正當的商人和投機者包圍了。

納粹和維希的間諜緊緊地包圍在戴高樂的周圍。幾個驚人的傳說現在水落石出了。例如，一九四〇年英國海軍在大卡爾（Dakar）作戰大敗，這是因為柏林和維希的間諜從戴高樂的參謀部中得到情報。另一個事實：著名的抵抗運動人員——瑪林（Jean Moulin）、杜佛斯（Etienne d'Orves）和其他法蘭西愛國者——在他們回到倫敦，和戴高樂建立連繫的當兒，就被納粹的蓋世太保射斃了。戰爭以後，眞相大明，他們是被戴高樂手下一個叫哈第（Rene Hardy）的人出賣的。

戴高樂的祕密機關出賣了良心和國家，並在倫敦和

維說：「我是一個法西斯主義者。」也沒有一個教皇說過：「我是一個民主主義者。」教皇因為在戰爭或政治鬥爭的二方都有忠誠的信徒，他自己絕不會有這種方式的表示。在天主教會需要獨裁者與民主國家總統的幫助時，對於國家統治的形式採取普通而模棱的態度，實為教皇政治策略的一個必要部份。

此外，無人能正當地說大多數的美國天主教徒已為法西斯主義者，也不能說目前的美國僧侶團是法西斯主義者（三十年代的僧侶團就很可懷疑）。考夫林、古蘭等主教及基督教陣線也不能代表今天的美國天主教教義。參加上次大戰的美國天主教徒是像其同伴一樣的竭力反對法西斯，他們的忠誠與英勇，無人能予以懷疑。不幸我們必須指出，參加反美戰爭的天主教徒比為保衛美國而作戰的天主教徒人數更多，而教會則以同等臨終塗油禮祝福這些人，教皇為義大利的總主教，對於向美軍作戰的本國人民自然要熱烈祝福。但教皇於戰爭期間也在梵蒂岡數次為作戰的德軍祝福。

三

一九二二年墨索里尼攫取義大利政權，天主教僧侶團並未予以嚴重的反對，也未勸令他的人民出而保衛民主政制，也未特別宣布其對獨裁制度的反對。在墨索里尼進軍羅馬之前不久升任教皇的庇護士第十一，以前曾任米蘭的主教，他是最不信任民主政治的，而且堅決反對社會主義，曾在教書中說：「社會主義對於人類社會的想像是完全違反基督教的眞理……無人能在同時做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與眞正的社會主義者。」

假如教皇發表一個關於法西斯主義的同樣聲明，歐洲的前途將是怎樣的不同啊！他在任米蘭主教時，曾在大教堂內舉行無名英雄典禮時，給予墨索里尼的黑衫團以榮譽座位，並有意地不攻擊黑衫黨的政治原則。

有名的天主教學者杜伯林大學教授平吉（D. A. Binchy）在其所作「法西斯義大利的教會與國家」一書中說到教皇第十一：「教皇相信民主政治過於羸弱與不堅實，不能作為防止共產主義浪潮的水閘，一種奇特的境遇使他轉而求諸新的極權政府形式，視它為有效抵抗的唯一希望。」在一個天主教徒佔百分之九九的國家中，教會當有力量在法西斯主義萌芽時即予以摧毀，可是相反的，教會却加以默認，而最後則與之合作。

庇護士第十一在二十年代時尙未特別鼓勵法西主義，但後來則與之發生密切的關係，兩者幾至無法分別得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教皇宣佈說，墨索里尼是「上帝所派遣的人。」在美國，如沙爾維米尼（G. Salvemini）與賴庇拿（G. Lapiana）教授在其所著「對義大利應取如何態度」一書中所指出，上層的美國主教都同意義大利教會對墨索里尼的讚揚。克里扶蘭主教認墨氏為「支配命運之人。」曾經得到法西斯最高勳章的波士敦主教尊崇墨氏為「上帝所賜與義大利的政治天才。」海斯（Hayes）主教獲得四個法西斯獎章，也報以感謝之辭。

在這時期中全世界的天主教作者都幫同法西斯主義毀謗民主政治，而未受他們上司的譴責。一九三一年英格蘭天主教宣傳家貝洛克（Hillaire Belloc）在他「一個天主教徒的論文集」中描寫義大利的情形說：「反天主教與共濟會的組織已經因議會與他們假裝的權力之禁止而切實地消滅了，這種假裝的權力祇是控制一個腐化組織之少數富人的面具。」在墨索里尼上台後十三年，要一個有名的英國天主教徒陶遜（Christopher Dawson）在他「宗教與現代國家」一書中說：

「……毫無疑義地，教皇李奧第十三與庇護士第十一教書中所說的天主教社會觀念與法西斯主義社會觀念的關係比它與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社會觀念的關係更為密切。同樣的，天主教主義對於極權主義的國家理想顯然並不敵視。教會反對多數神權與無限制言論自由的自由主義理論，而擁護當局與僧侶團的原則及國家特權的觀念。統治者不僅為人民的代表，他有一種獨立的權力並對上帝直接負責。他的基本責任不是滿足人民的希望，而是公平地與妥適地統治，他在完成這種責任之時，人民方面的任何抵抗即為嚴重的罪惡。」

當教皇在危急時期中丟棄牧師斯脫索（Stwzo）所領導之非正式的天主教人民黨，並於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與墨索里尼政府簽訂拉脫蘭條約後，義大利個別天主教徒反對墨索里尼之嚴重的罪惡是終止了。

依照透視畫法，拉脫蘭條約似為現代史上一個最重要而最悲慘的事件。條約簽訂後，墨索里尼獲得了他開始發動國際性法西斯侵略所需的信心與尊敬。墨索里尼為報答起見，對梵蒂岡作下列漂亮的讓步：(一)建立梵蒂岡國家，享有治外法權，並予舊有教皇領地以九千萬美元額外償金。(二)採取下述規定：「不僱用或繼續僱用背教的與開除的牧師做教師或担任與公衆有直接接觸的任何職務」。(三)對承認犯罪的牧師予以分別監禁。(四)重新承認「天主教教皇與羅馬教為唯一的國教」。(五)公立學校教授天主教教義，主教並有權辭退相信異教的任何宗教教師。(六)由國庫支付牧師的一部薪金。

在此條約墨瀋未乾時，墨索里尼即予以破壞，於是教皇即在其教書中以數句悲哀而憤怒的言辭譴責墨索里尼。在美國的天主教宣傳中即引用這一教書來證明教皇是反法西斯的。實際上，教皇之譴責墨索里尼，並不是因為他是一個法西斯主義者，而是因為他反對天主教。他對於墨索里尼殺害義大利勞工領袖、剝削義大利人民的民主權利及摧毀言論與講授自由，則並未加以譴責。他的唯一反法西斯的言論是他對一九三八年墨索里尼反閃族法律的攻擊。在那個時候，教皇對希特勒交涉的經驗已教訓他不能再寬恕種族狂了。（譯自美國民族週刊）

維希、華盛頓和柏林之間互通聲氣。在法國被佔領的期間，巴斯梯（Bastid）——戴高樂情報局的一個祕密工作者，同時也是法越銀行顧問和德國間諜——被德國情報處派往西班牙作一負有「特殊使命」的旅行。佛蘭南（Henri Frenay）——戴高樂的一個部長——有一張由維希政府內政部長所發的護照，允許他在維希法國「非佔領區」自由旅行。這種例子，眞是不勝枚舉。

戴高樂的「第二局」握有物質和技術的工具從事這種活動，這些都是由英國政府和法國兩個區域中的反動派所供給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戴高樂的職使，正如前面所講到的，只單是作為別人見解一個工具而已。他並不因他所服務的利益的矛盾而感到憂慮，他準備同意每一件事，只要他能在手中握到權力為條件。

正是這種權力的貪慾，使戴高樂經過一連串的變化後，和華爾街締結了契約。關於這，我們過後就要說到的。（未完）

春在莫斯科

英·Ralph Paker
小端　譯

春光撫育着蘇維埃廣闊大地。在裏海上，一隊隊的油船，把燃料從巴庫運送給正在俄羅斯無邊原野上開動着的牽引機和播種機。

每一個地方都在忙着建設。史大林格勒的「紅色的十月」冶金工廠的工人們——這次大戰中最有決定性的戰役就是在這裏打的——已經向世界宣告，他們將在明年年底以前完全完成他們的復興工作，那就是說，比預定的計劃提早了十二個月。

在過去幾星期裏，有二十五萬個蘇聯青年加入了「勞動後備學校」；他們充分相信，當他們學成以後，國家一定有工作給他們做。在克里姆林宮裏，蘇聯的政治家們向全世界宣告，他們的耕地增加了，他們兒童入學的數字增加了，他們消費品的生產和分配增加了。

可以想像，在這大地春回的時節，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正不知有多少事情在等待着他們完成，蘇聯人民對於他們國境以外的世界是沒有多大興趣的。老實說，他們的確感覺到，他們的國家對鞏固和平最有價值的貢獻，就在於他們迅速而加緊地從戰爭的蹂躪中復員起來，就在於他們迅速而加緊地從蘇維埃社會主義前進到蘇維埃共產主義。

蘇聯在巴拿馬附近并沒有殖民地屬地。它的人民不可能為所謂南極邊緣的利益受到「威脅」而激起一陣莫須有的憤怒。它的政府沒有任何必要去製造一種對假想的危險的恐懼，來轉移民衆對於內政問題的注意。

但是，蘇聯民衆是熱切地關心着國外事態的進展。足以說明這一點的是：讀者對於讀報紙上外國消息的熱中，國際問題演講會聽衆的踴躍，以及特別是討論會進行的頻繁。在一個為拯救世界而戰鬥的人民當中，是不可能有「孤立主義」的。

一個普通的蘇聯公民今天是怎樣在看這個世界呢？在他們看來，什麼地方容許控制着美國當前政策的這個勢力活動，什麼地方就會出現一個形式上反蘇實質上反動的局面。從日本到西歐，美國的大資本家們正在阻攔着各國人民社會生活深刻的變革，而這種變革正是全世界今天所努力爭取的。

關心世界事務的蘇聯人看見這股逆流正在行進；在伊朗，美國製訂了一個三年計劃，要裝備當地的武裝部隊，要重整公路，要建造「重要的」機場；在土耳其，這地方已經漸漸地變成了美國在近東的一個軍事戰略基地；在希臘，美國正在不惜工本地要完成對愛琴半島的控制，使成為從直布羅陀到達達尼爾美國的地中海計劃的一部份。

對於這些事件以及其他各地的類似事件，蘇聯人的關切，與其說是因為他們担心着它對於蘇聯將產生什麼影響，毋寧說是出於他們對於世界各處災黎的同情心；這完全是蘇維埃思想的一個特質。

有一個蘇聯人最近說過：「自從史大林格勒以後，什麼事情也不能使我們驚惶了……他們可以咀罵我們，但是，我不相信他們會咬傷我們。他們咀罵我們，因為他們看見了我們的力量。我們已經告訴他們，我們的國家是強大的，我們的人民也是強大的。我們也告訴了他們，世界上最好的人民都是和我們站在一起……」

蘇聯的心關切着每一個因為信仰某些觀念而正受着苦難的「最好的人民」，這些觀念在蘇聯早已變成了事實，但是在這個世界上其他的許多地方，這些觀念足以把一個人送進牢獄，或者丟掉他的職業。當一般的蘇聯工人讀到，在英國，一九四八年底將有四十五萬個工人失業；在法國和義大利，因為外國資本操縱市場，工廠紛紛關門；他繫念着這裏失業的工人，并不是作為單單是政府統計失業數字中的一個單位，而是作為一個人，一個和他自己一樣的人。

他知道，蘇聯工廠生產的消費品應當產量更多質量更好；他也知道，在技術上蘇聯是有基礎達成這個目的的。但是，他也知道，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命令他的政府它應當實行什麼經濟政策，也沒有任何人能左右它的計劃，它的計劃是要為了全人類的福利進一步開發它國家的天然資源。

這個國家的人民已經習慣於一種政治經濟的制度，在這個制度裏，為了一個集團，一個階級，甚至一個民族的私利而設立限制條例已經成為不可能。某些美國汽車出口商有意地停止對瑞典汽車公司輸出汽車零件材料，好讓美國的汽車可以充斥整個瑞典的市場，這種例子在資本主義世界裏是司空見慣的；可是，當一個蘇聯人讀到這消息時，他會大為驚奇，他不僅覺得這是一種浪費，而且是犯罪的——就和把大量的咖啡有意的銷燬，或者在一個飢餓的世界裏用麥子去飼養牲畜，一樣是犯罪的。

當蘇聯政府和毗鄰的社會主義國家成立商約時，這裏并沒有什麼「商人大亨」在搖頭，也沒有什麼「出口商人」在莫斯科從事「運動」。現在，東南歐和東歐都已和帝國主義系統分裂開來了，它已經沒有恐懼再度成殖民地的必要了。

當你和消息靈通的蘇聯人討論到國際局勢時，你會發現，在他們腦子裏，第一個問題就是德國問題。他們相信，英美的統治集團業已開始追隨一個復興德國帝國主義的政策，羅卡諾和慕尼黑的精神籠罩着巴黎、倫敦和低地國家首都之間一切的陰謀活動。

蘇聯人決不相信，布魯塞爾條約是為了反對德國維持安全的一個工具。有一個評論家就說：「華爾街獨佔資本家和魯爾的大資本家之間的聯盟能夠維持一個反對德國侵略的安全，就好像一根繩子能夠維持一個吊死鬼的安全一樣。」

蘇聯一般的輿論之所以沒有為西方的戰爭叫囂而驚惶失措，一部份原因是，對於他們這一套，蘇聯早就經驗過了。美國在歐洲所進行的干涉，在蘇聯人眼裏，這不過是當年走向羅卡諾時代的反革命活動的翻版而已。

可是，蘇聯人認識到，在今天的形勢中却有了一個基本的不同之點，那就是，在東南歐存在着一系列在進步政府領導下的國家，這裏國家決不容許任何外國分裂它們，或者控制它們的經濟生活，把它們重新變為魯爾工業的附庸；今天，這已經不可能了。

蘇聯文化三十年(下)

劇場・戲劇・音樂……

柏園 譯

劇場

蘇維埃時期戲劇的歷史是從十月革命最初的幾天開始的。革命勝利後的第三天（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九日）教育人民委員會（委員長A・盧那卻爾斯基）成立了，於是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列寧格勒）的劇場就和其他文化機關一道受它的指揮。

在古老的「古典遺產」中，凡是優秀而且藝術性的作品，都獲得蘇聯人民的熱心支持，他們急不及待的接受了俄羅斯戲劇的最高貴的傳統——它的政治意義、它的教育價值、它的現實主義和對符合人民利益。舊戲劇的多數代表們，選擇了與蘇維埃政權友好合作的道路。

教育人民委員會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下了一道特別命令，規定藝術工作者可免參加強迫性的勞動服務——原來在經濟崩潰和內戰時期，城市人口當時都動員起來爲共和國而作艱苦鬥爭。

一九一九年八月通過了「劇場經理的組織法」，私有的劇場不許繼續存在，全部劇場（都會的和鄉鎮的）都落在國家手裏，劇團直接受教育人民委員會的管轄——一九三六年起，改由藝術委員會的管轄。

從蘇維埃政權最初的日子開始，戲劇就深入羣衆中去。工廠工人享有特別的表演，全部劇場的坐位留下百分之三十給紅軍觀衆。劇團和演員的旅行表演，經常在工人區、入伍站和內戰前線舉行；演員和觀衆也常常開會討論所表演的戲劇。

蘇維埃劇場迅速的大衆化了，這是全世界別處所沒有的。蘇聯戲劇最動人的兩點，就是旅行劇團和羣衆自己的業餘劇團。

蘇聯劇場的初期劇目，是充滿着英雄事件的，也混和了革命的浪漫主義。

瑪耶可夫斯基（V. Mayakovsky）的動人的政治性戲劇：Mystere Bouffe，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七日在彼得格勒音樂院的大禮堂，爲紀念十月革命一週年而演出。作者親自導演這部戲，同時參加它的演出。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國際工人節，基輔頭一次演出韋加（Lope de Vega）的通俗悲劇 Fuente Ovejuna。這部戲看上去好像反映當時的革命戰爭，因此連續演出四十二天，極受歡迎；，觀衆激動到大唱革命歌，而且停演後很久，在街上還聽見那樣的歌聲——而前線只是離此不遠呢。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彼得格勒建立了一個新劇場（「大劇場」），這是高爾基、盧那卻爾斯基、詩人布洛克（Blok）、演員莫納荷夫（Monakhov）和俞尼耶夫（Yuniev）所創辦的。這是一個上演古典悲劇的劇場。

一九二二年，在莫斯科建立了革命劇場，專門上演進步的現代劇，也是頭一個上演大量蘇聯劇的舞台。

從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二年，這是蘇聯戲劇迅速發展的時期，新的劇團到處成立起來，在城市、在工人區、在民族共和國、在鄉村，尤其在前線和在紅軍的單位裏，按照紅軍政治部的統計，一九二〇年時紅軍有一、二一〇個劇場單位和九一一個演劇團體。

革命後的幾年，工農大衆業餘演劇有着顯著的發展。這發展在深度、嚴肅性和內容方面與年俱增。

一九三二年七月六日，全蘇業餘劇團舉行了第一次的奧林匹克，從此之後，就不斷的舉行。一九四五年俄羅斯聯邦共和國（卽蘇俄）舉行了農村演劇人才的盛會，參加表演的個人共達八七九、四〇六人，團體有六四、三九二個。分散在全聯邦的許多俱樂部和民間藝術中心，協助着業餘戲劇活動。一九三六年在莫斯科還建立了一個民間藝術劇場，吸收了全國各地最優秀的演劇人才。

蘇聯的戲劇藝術繼續不斷在樣式和形式方面伸展。新的劇團組織了，新的劇場建立了。在革命前的俄國，只有一百五十三個劇團，大多數是在大城市裏用俄語演出的。蘇聯的劇場總數由一九三三年的五五一所增至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的七八五。今天，單在蘇俄一國，便有三七九所劇場。在七八五間劇場當中，四二一所用俄語演出，其餘的便用其他民族語演出。

目前蘇聯的劇場建築共有五三九座。納粹所破壞的已在重修中，新的劇場也在建立中。到了一九五〇年底，預計劇場的數目可達八九八所。

一九三九年蘇聯的劇場全部座位達二四二、六四三座，連流動劇場在內，則總數達三九〇、〇〇〇座。一九三八年蘇聯演出了一五七、一一三次，觀衆共計七八、一九二、四〇〇人。

戲劇活動

蘇聯的戲劇活動底涵義是很廣泛的，它包括了話劇、歌劇、舞劇、少年戲劇、木偶戲、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劇團、軍隊劇團、旅行劇團、鐵路工人劇團等。

蘇聯三十年間各民族的戲劇活動也有長足的進展。在一九一七年之前，甚至像阿美尼亞、塔什克、土耳克門和啓爾吉茲那樣重要的民族，都還沒有職業劇團。連白俄羅斯都沒有常開的劇場，別的少數民族更不用說了。今天，阿美尼亞有二十九個劇場，土耳克門十一個。一九四六年喬治亞有四十個，卡薩克斯坦——四十二個，阿塞拜然——二十八個，塔什吉斯坦——十七個，烏克蘭——一〇三個，烏茲貝克斯坦——四十個。

各民族的演劇經驗也在廣泛的交換着。一九三〇年六月在莫斯科舉行了各民族的藝術節，參加表演的有二十三種民族。一九三六年在莫斯科舉行了烏克蘭藝術節，接着就有卡薩赫、喬治亞、烏茲貝克、啓爾吉茲、阿塞拜然、阿美尼亞、白俄羅斯、塔什克和布里亞特蒙古的民族藝術節。

在蘇維埃時期，民族戲劇已經產生了若干舞台名角，聞名全蘇。得到蘇聯人民藝術家榮銜的非俄羅斯籍演員，已有二十五名。

在沙俄時代，兒童並沒有特別的劇場。早就在一九一八年，教育人民委員會下面就設立了兒童戲劇部。一九三七年，兒童少年劇場已有八十九所，這當中包括了木偶劇場和少年演員劇場。到了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兒童劇場的數目增至一四六所——其中有四十五所是少年演員劇場，一〇一所是木偶劇場。

在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中表演的劇團，已經很流行了。這一類劇場的最初一個，是一九三四年在莫斯科區韋涅夫鎮出現的，在這些劇團還沒有組織之前，旅行劇團和演員們就已經常到農村去表演。在三十年代中葉，集體農場劇團的組織採取了一種羣衆性的活動。

一九三六年二月，莫斯科區的集體農場劇團舉行了第一屆的戲劇節；一九三九年在莫斯科舉行了全國性集體農場劇團的總檢閱。愛國戰爭前，這一類劇團已有二百個以上。

戲劇學校

一九一七年之前，戲劇學校只在大都會——「皇家」——劇場的支持下纔能開辦。十月革命後，戲劇教育已經對所有熱中此道的人開放了。

一九三七年，全蘇聯有四所戲劇藝術研究所（分在莫斯科、列寧格勒、特比里西和基輔）和四十八所中級的戲劇學校。入學的學生包括六十二個民族，所用的語言也很多。

到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已有十四所研究所——分設愛沙尼亞、喬治亞、阿美尼亞、阿塞拜然、中央亞細亞、烏克蘭（兩所）和白俄羅斯的研究所。中級的戲劇藝術學校也有相當的增加：一九四六年已有戲劇研究室一一二所，舞藝學校十六所，話劇學校八所，馬戲學校二所，劇場藝術（訓練道具、服裝、裝飾等人才）學校一所。

在戰爭中，戲劇運動也在戰線上展開。

蘇聯人民對於戲劇工作者有着高度的尊敬。若干工作者已榮獲史太林獎金。有的做了政府官員，有的成爲最高蘇維埃代表。

全蘇戲劇界今年特別注重有關蘇聯當代生活的戲劇的演出。同時，蘇聯劇團也還繼續演出古典的劇目。

音樂

在蘇維埃時期，音樂藝術也獲得了偉大的成就，廣泛的深入人民大衆中間去。歌劇、音樂會及其他音樂表演，從沒有一個時期像現在似的，吸收了那麼多的觀衆。

單就莫斯科一地來說，下面的數字就表現了過去三十年間有着怎樣的進展。一九一三年全城只有五個音樂會堂，音樂會全年共計舉行約一百次。一九四六年音樂會堂共有七十三所，舉行音樂會共二千五百次，參加的聽衆共三百萬人。

音樂部門的活動是革命後立即進行的，其時，新的聽衆開始進入音樂會場了。音樂會和帶有教育性質的音樂演講會；差不多每天都有。它們的目的就是要提高羣衆的一般文化水準，滿足他們急切的藝術需要。

在這之後，音樂會的活動經常增長。一九四〇年全蘇共有九萬次公開的音樂會：一九四六年這個數目已增至十二萬次，聽衆有四千萬人。

蘇聯音樂反映了各共和國各民族的文化特徵。在蘇俄，有許多俄羅斯的歌曲合唱隊和民族樂器的樂隊：同樣的組織也在各共和國裏成立，這當中包括了中央亞細亞和外高加索。一九四〇年，全蘇共有交響樂團一五四個；今年，已不止二百個。這當中，有些是在離開首都很遠的地區——如阿瑪·阿達（Alma-Ata）、弗隆齊（Frunze）和史太林那巴德（Stalinabad）等。

交響音樂會的節目是豐富而且多變化的。全世界的音樂珍品都可以在蘇聯的音樂會裏聽到，自然，蘇維埃和俄羅斯古典音樂也佔着顯赫的地位。莫斯科最近兩季的音樂會，就包括了莫扎特（Mozart）的「鎮魂樂」（Requiem）克魯賓尼（Cherubini），裴遼士（Berlioz）韋爾第（Verdi）的作品，亨德爾（Handel）的「沙遜」（Samson），巴哈（Bach）的「莊嚴彌撒」（Missa Solemnis）等。

音樂競賽

在蘇維埃時期出現了無數輝煌的音樂家；經常舉行的種種比賽很重要，比賽使這些音樂家出名。在舊俄，比賽會也有的是，但充其量只不過是特別幾個部門（大多數是鋼琴或小提琴）幾十個演奏家之間的事。但是在蘇聯，音樂比賽卻是由國家主辦的。這些比賽通常經過三度關頭。拿一九四五年最近一次的比賽來說，第一關是區域比賽——同時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和加盟共和國各首都及蘇俄若干大城鎮舉行。參加比賽的人受到種種的鼓勵。這一次，參加的共有青年演奏家共一千人，其中有二百個在初賽中獲選，於是到莫斯科去參加複賽（第二關）。初賽之前很久，參加者都得到充份的假期（薪金照付）來練習。到莫斯科來的外地人，在複賽和決賽期間還得到免費居住，搭車搭船也不要錢；聲樂家和絃樂演奏家則免費得到熟練的伴奏者。決賽時這些演奏家都由管絃樂伴奏。

在戰前已經舉行過好幾次同樣性質的比賽：一九三三（莫斯科）和一九三五（列寧格勒），後一次包括鋼琴、聲樂、及各種弦樂器管樂器。一九三七年曾舉行鋼琴、小提琴和大提琴的比賽；一九三八年曾舉行指揮者比賽和弦樂四重奏比賽，一九三九年曾舉行雜耍藝術家比賽。

先後全體得獎人數已超過一百人，其中包括著名的鋼琴家如吉列爾斯（E. Gilels）弗列爾（Y. Fliere），列希特（S. Richter）麥爾張諾夫（V. Merzhanov），小提琴家如奧伊斯特拉赫(David Oistrakh)，還有指揮姆拉汶斯基（E. Mravinsky）等。

有許多蘇聯比賽得獎的，在國際競賽中也得到獎賞。蘇聯音樂的一系列勝利，是由一九二六年開始的；其時十九歲的奧波林（Lev Oborin）在華沙國際蘇邦紀念慶祝會中得到第一獎。一九三五年弗列爾在維也納的鋼琴賽中得第一獎。一九三七年吉列爾斯在布魯塞爾的競賽中得第一獎。一九三八年薩克（Y. Zak）在華沙第三屆蘇邦慶祝會中得第一獎。同年奧伊斯特拉赫在布魯塞爾的國際小提琴競賽會上得第一獎。一九四七年在布拉格青年節中，一大羣蘇聯的演奏家得到第一獎。

蘇聯音樂史上一個重要的特徵，就是歌劇在一些革命前連這個詞兒聽也沒聽過的民族中的發展。許多民族的第一部歌劇都是在三十年代中葉寫成的。

這些新歌劇院演出他們自己的民族歌劇，同時也演出古典歌劇。柴可夫斯基（Chaikovsky）的「歐根·奧尼金」（Eugene Onagin）就曾在中央亞細亞所有的歌劇院中上演，歌詞也譯成各種民族語。

作曲家聯盟

蘇聯作曲家聯盟盟員最近共有一一〇八人。主席是格里愛（Gliere）。聯盟協助各民族的聲樂發展。聯盟在音樂會的組織工作和國立音樂出版局的出版工作上，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聯盟還設立音樂基金，協助音樂家的創作。一九四七年這項基金達二千五百萬盧布。凡是會員因年紀老邁或生病不能工作時，就由基金撥款維持他們的生活。聯盟在莫斯科有一幢十層樓的房子，專供音樂家們居住。這幢大房子裏面有聯盟的主席團辦公室、中央作曲家協會，還有一個音樂會堂、一個豐富的音樂圖書館。（節譯自 Soviet Literature）

Monda Kulturo　World Culture
Culture Mondiale　Weltkultur
Cultura Mundana　Культура Света
Cultura Mondiale　Wereldcultuur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十九期